

的編者話

歡慶百年辛亥 緬懷慶齡女史

今年適值辛亥革命一百週年，炎黃子孫理應慶祝。時移世易，由於政治氣候的轉變，中國政壇領導層開始大事修補往昔對國民革命的貶損。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，由「資產階級革命家」，進為「偉大的革命先行者」，但總體而言，是將辛亥革命成果「收為我用」，經過一輪的移花接木之後，將自己定為中國翻身的救世主。

台灣雖然體制上仍尊孫中山先生為國父，但民間對辛亥革命的表現，甚為冷淡，以至於大選當前，國民黨作為執政者亦不敢冒流失選票的風險，將辛亥革命的慶祝調子放得太高。這固然令人有世態炎涼的感慨；但從另一角度看，亦反映出民主選舉體制對執政者的制衡力量；對照於海峽對岸的官場亂流，黑箱作業，台北當局作為執政者的顧忌，映照出一定的積極意義。

辛亥革命誕生於清末風起雲湧之際，當中涉及的人物，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褒貶，當中不少人物在初出道時，廣獲好評，被視為民間希望；豈知一朝當權，又將百姓魚肉為芻狗。以致有革命前輩要慨歎：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苦蒼民數十年。」

涉及辛亥革命的芸芸眾人之中，最為筆者敬佩的，首推宋慶齡女史及馬相伯先生二人。而在國共兩黨的史家眼中，宋慶齡相信也是雙方均予以極高評價並能欣然接受的少數人物之一。

宋慶齡女史對辛亥之後的現代中國之所以重要，不在於其被譽為「國母」的特殊地位，而

在於她身處權力的核心圈子，但一直不為權力所惑，相反，卻處處為弱勢無助者奔走呼籲。一九三二年「一二八事件」爆發，國人救國的呼聲日高，但執政者卻一意鎮壓民意，肆意拘捕異見人士；這驅使年屆九二高齡的馬相伯與國父遺孀宋慶齡攜手，聯同社會上多位知識份子領袖，組織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」，為受迫害者爭取公平對待。

一九三六年五月，馬相伯老人更與宋慶齡在上海合組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，為國家命運發出知識份子的良知之聲。而其後救國聯合會的骨幹如鄒韜奮、史良、李公樸、王造時、沙千里等七人，被政府當局無理拘捕，宋慶齡不畏艱辛，到拘留七人的蘇州監獄要求與他們一同受刑，最終迫使當局難敵民意，讓七人保釋出獄，史稱「七君子事件」。這是辛亥革命以來民間異見人士難得的重要勝利。

這兩位基督徒，一位是學貫中西的牧師之女，一位是兩度加入耶穌會但未能適展抱負的天主教徒，在辛亥革命之後三十年的動盪政局中，能攜手為中國發出良知之聲，值得我們這些後輩基督徒感到榮幸，但也值得我們加倍互相策勵，在強權之前，絕不後退，絕不怯懦；相反，必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，與受苦的百姓同行。

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的中國基督徒，在辛亥革命及其後的中國發展中，扮演了不少積極的角色，只是在過往歷史學家的著墨不多；值此辛亥百年之際，我們特別請多位學者為大家執筆，盼為中國近代史研究，開拓更廣闊的門徑。

林瑞琪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 辛亥百年來臨之際

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